

# 根据本土实际进行独立的学术创新\*

## ——路遥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访谈录

崔华杰访谈整理

---

**【编者按】**路遥,1927年生,福建福州人,195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并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山东大学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路遥投身于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并形成了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受到中外学界关注,为山东大学赢得了“义和团研究重镇”的学术美誉。著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等书,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清史文献丛刊·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等课题。本次访谈主要围绕路遥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学术风格的淬炼与形成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

---

### 一、“政治大课”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门径的开启

**崔华杰:**路先生好!您于1947年考入山东大学,迄今在校已度过76个春秋。请介绍下您的求学背景?

**路遥:**我是1927年12月生人,祖籍福建省莆田市,自幼在福州市区长大。我本名吴松龄,在青岛解放后随着进步学生的改名风潮而更名为“路遥”,并在接下来的教研生涯中通用该名。1947年春,经过在福建省立高级中学的学习,我开始准备投考大学,参加了南京中央大学、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和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考试,最终被国立山东大学录取。国立山东大学1938年春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南迁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不久之后被迫“暂行停办”,直到1946年8月才在青岛重新开办,所以我是学校复校后开招的第二届学生。我高中时期的中文基础较好,尤其喜读古文,在报考之前就听闻山东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有老舍、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公渚、萧涤非等大家,因而心向往之,决意前往青岛求学,并被顺利地录取到中文系读书。

**崔华杰:**您是在何种机缘下转入历史系的,历史系的师资阵容如何?

**路遥:**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之初,其文科虽然只有中文和外文两系,但所谓“六经皆史”,所以中文系里面有个别做史学研究且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学者。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本来就是史学出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业经路遥审定。

身,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师从顾颉刚,做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除了杨向奎,中文系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还有丁山和赵纪彬。丁山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来校工作,在文字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宗教学等领域皆有建树,而赵纪彬解放前就与侯外庐等人合撰《中国思想通史》一书并在学界赢得大名。另外,王仲荦在我入校当年也来青岛工作了,他做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来山东大学执教之前曾在中央大学任教。据我所知,此时专做史学研究的学者,恐怕就上述几位较为出名。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学校在文学院下增设历史系,由文学院院长杨向奎兼任系主任。此时专做史学研究的教师队伍,除了上述几位,还有校长华岗、原上海博物馆总务部主任童书业以及刘导生、黄绍湘等人。校方动员文学院的中文、外语两系学生转到历史系,这样我作为中文系大二学生便转到历史系学习了。

历史系的师资阵容变得齐整起来,是在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齐鲁大学并校之后。1951年3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其中山东大学文史系历史组与华东大学史地系合并为历史系;同年9月,齐鲁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复又并入。这样,山东大学历史系就汇纳了原国立山东大学、华东大学和齐鲁大学的三校师资。分学校来说,原国立山东大学有杨向奎、郑鹤声、黄云眉、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孙思白等老师,齐鲁大学方面有张维华、莫东寅、徐绪典、韩连琪等老师,华东大学则有蒋捷夫、陶官云等老师。山东大学的历史学科此时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领域都有专人所长,且在国内已经具有不小的学术声望。

**崔华杰:**您为何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作为自己的治学领域?

**路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要发生转变,要向社会主义新型教育体制过渡。在国家看来,一些知识分子只专心于学术研究,对政治不太上心,甚至还有人抱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如何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成为高校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在校长华岗的推动下,山东大学形成了“政治大课”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虽然都说山东大学“政治大课”为此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树立了样板,然而从全国范围来说,这不是山东大学的首创,只是在校长华岗带领下搞出了名堂和特色。

华岗在1949年来山东大学工作之前,是一名活跃在宣传战线的职业革命家,曾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并担任首任总编辑,理论素养很高。而且,华岗还是最早使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著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奠基之作。1948年,当我还是一名大二学生时,曾在青岛一家售卖进步书籍的书店“祥记行”买到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作为进步书籍私底下阅读学习,这可能为我埋下了以后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萌芽,所以我自认为是华岗引领我走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道路。

华岗除了给全校上“政治大课”,还给中文系师生上专业课,主讲的内容就是他的治学专长——中国近现代史。我记得他所讲第一课的主题即是义和团运动,而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来评价义和团运动。上课时,华岗问大家对义和团的看法,只有我援用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的相关话语作了回答,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在课后不时对我进行鼓励。华岗希望我多同中外交通史的大家郑鹤声接触学习,看看能不能对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进行史实查核和史料扩充。也就是在与郑鹤声的接触中,我逐渐掌握了史学研究的一些路径和方法。就是这样,我一步步迈入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道路。

**崔华杰:**山东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如何成型的?

**路遥:**青岛解放后,经过几年发展,山东大学根据高等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将正式建系不到四年的历史系与传统系科中文、海洋生物等一道列为校级重点发展学科。学校在文科中重点建设历史系的历史专业,在历史专业中尤以“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为重点发展方向。我们知道,这里提到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其中又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前后进一步界定为近代史和现代史。

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方向的奠基人,是华岗和郑鹤声。华岗因专事革命史研究而踏足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以鸦片战争为近百年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开端,把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工人大罢工、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南昌起义等作为重要历史节点叙述,由此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框架;郑鹤声于1931年所出版的《中国近世史》一书,以明正德年间欧洲人东来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概述了明末以来三百年间的中国历史变迁,被顾颉刚赞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学术流派。中国现代史方向的研究则由孙思白承担,他和李新等合作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使其扬名于国内史学界。就是在这些先贤接续努力下,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于此奠基并发展赓续至今。

**崔华杰:**山东大学此时实施的“政治大课”制度,成为全国高校理论学习的一大创举。这样的校园文化对您的治学道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路遥:**山东大学经过与华东大学、齐鲁大学等校合并,加上随之而来的院系调整,其阵容有了较大变化,来源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为破除师生员工固有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学校认为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从而使他们树立起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经过一两年的理论学习,山东大学不仅塑造了“政治大课”这一思想教育品牌,还形成了“趋时”“求新”的校园文化。

所谓“趋时”,就是山东大学通过“政治大课”这种政治理论学习形式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思想教育,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而“求新”则是指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引导教师队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虽然当时山东大学历史学者群体中,除华岗校长外,基本上没有专做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者,甚至找不到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课程的师资,但据我所知,一些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多年的知名学者在新校园文化的影响下,敢于运用新理论新知识,突破已有的知识藩篱,并取得了海内外学界为之瞩目的学术成就。比如,童书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古史辨”派的中坚力量,来山东大学工作后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吃透了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并将之作专题课程进行讲授,引导青年学生对马恩经典的学习和领会。他还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扬名史学界的名篇大作。我毕业留校后曾给童书业做了几年学术助手,他经常向我提及梁启超的名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认为个人的学术理念要随时代思潮而不断发展。对此我深有感触,并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将这一名言作为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时刻警醒学术研究者要敢于破除己见、革新思想。

除了童书业,一些年轻教师也积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赵俪生于1950年从东北师范大学转聘来山东大学任教,两三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专题研究,并在1954年与其夫



人高昭一合作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著作——《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他在研究上的一个学术亮点,就是从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入手,突破“农民—地主阶级斗争”的学术路径,形成了很具个人风格的理论体系,因而被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与赵俪生的资历相仿,1952年来山东大学工作的吴大琨,短短几年内也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发表了几篇好文。就是因为新老研究者的竞相投入,学校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学者才逐渐充实起来,后来成立了以华岗、蒋捷夫、赵俪生、吴大琨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我看来,这几位教授的共同特点就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专业学术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个人的思想改造,也逐渐摸索出重视理论、运用理论的研究风格。

在中国史坛“五朵金花”学术论战中,杨向奎和童书业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论题,在《文史哲》上发表多篇文章,吸引国内不少学者投入研究;王仲荦则在这一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与武汉大学唐长孺并称为“南王北唐”;赵俪生则走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研究前沿,培养出一批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当时我只是一名刚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无论思想理论还是专业学术研究上都处于“开荒”阶段,在这样的校园文化和思想激流的熏陶引领下,我进一步坚定了投身于专业学术研究的信心,并从中汲取厚重的理论养分。

## 二、田野调查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学术路径探索

**崔华杰:**“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奠定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叙事框架。您是如何切入“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并将之作为终生研究领域的?

**路遥:**我刚才说过,我尚在读书期间就读过华岗校长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并对其中的义和团运动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工作之后,由于我不是“根红苗正”的家庭出身,从事农民阶级研究可能在政治上对我比较有利。当然,使我决定投身于义和团研究的最主要因素,还是政治环境的促动和学术环境的影响。

从政治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历史上清算美国等帝国主义施加于中国人民的罪行自然成为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翦伯赞等人于1951年编纂出版的四卷本文献资料汇编《义和团》,其因就系于此。从学术环境来看,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的义和团运动,乃系农民阶级发起,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一运动难以有直接的文献史料存世,相应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尤其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比,义和团运动缺乏集中组织和统一领导,受复杂的民族和社会矛盾驱动发展,普遍性的爱国情感与个别性的蒙昧行动交织共存。如何评价这一运动的性质至今在史学界存有不小的争议。

1960年恰逢义和团运动爆发60周年,为纪念这一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反帝运动,中国史学会计划筹办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指示山东省要投入力量弄清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起因、地点、时间、组织、政治倾向等问题。山东省委宣传部把大会筹办工作和义和团研究任务交给了合署办公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此时,我已参加工作八年,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学界也产生了一点影响,但是考虑到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便奉组织委派投入政治史领域内的义和团运动研究。

**崔华杰:**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毛泽东也讲过“没有调

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实践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鲜明特征。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您运用这一方法有何契机?

**路遥:**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自发于基层社会的群众运动,缺乏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关于其组织和源流的一手文献存世不多。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华北区域,一些涉及其起源与发展的地方史志的相关记载也是东鳞西爪,不成系统。这场运动到底发生在直隶和山东的哪些区域,原因如何,有哪些组织,如何从源起地向外扩展,其政治口号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已有的学术成果不仅没有圆满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多有叙述不清、立论不明之处。比如,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在20世纪50年代被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然而在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方面也仅是谈及朱红灯及其在平原的斗争,从中无法窥察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全貌。总之,要想解决这些事关义和团的地理起源、组织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等问题,必须摆脱文献依赖,转换研究路径。

当时,史学界贯彻“厚今薄古”的治学方针,计划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制定教育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号召高校师生走进工厂、矿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撰写革命史、公社史、厂史和家史。在这种背景下,山东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义和团运动研究和田野调查。而且,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00年前后,当年参与这场运动的不少人此时尚还健在,这样就有了田野调查的受访者。因此,1959年年底开始,山东大学开展的横跨两个世纪的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工作揭开了帷幕。从栉风沐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前后持续了四十余年光阴。我也从参与到组织,从搜集调查数据到撰写专题论文,从英姿勃发的而立之年一晃走进了随心所欲的古稀之年。

**崔华杰:**在这一项横跨四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中,每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又取得哪些收获?

**路遥:**山东大学开展的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较大规模或者说较有系统的有十次之多。第一次是1959年底至1960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分赴鲁西北和鲁西南,主要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起因、组织和发展过程为调查要目,最关键的是找出义和团运动首发地的线索。两路师生跑了将近三十个县和六百多个村庄,共记录访谈资料七十余万字,后整编成《山东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一书出版。在这次调查中,我们通过地毯式搜查找到了义和团运动策源地之一的梨园屯,廓清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曹州府说”“冠县说”甚至是“寿张县说”“沂州府说”等源起说。根据这次调查所获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史料,我写了一篇名为《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的长文,指出义和团运动的斗争范围既广泛又分散,曹县大刀会、冠县义和拳和朱红灯为首的义和拳会等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各阶段都发挥了重要影响,这实际上框定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地理起源,即鲁西北、鲁西南和直鲁交界三个地区。

1965年年底至1966年年初,山东大学历史系展开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这次调查扩大了地理范围,不仅在山东地区进行地毯式调查,还重点走访了山东交界的诸省县市,前后去往山东、河北、河南、天津四省市的34个县开展实地摸排,最终搜集的口述史料大概有六十多万字。现在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这两次田野调查可以说是抢救性的也是不可回溯性的,因为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的一些老人,本来就已六七十岁高龄,加上此后又经历了困难时期的那些年份,不少人在此期间过世了。这两次调查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初步梳理义和团运动的地理源流和组织源流,第一次发现了义和拳组织以及义和拳运动的由来,查清了这一斗争实际上起源于冠县十八村的梨园屯与威县沙柳寨。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重回正轨,我们又有条件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1980年,我们组织师生专门到河北威县调查,围绕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人物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展开,

主要想摸清义和团运动的组织起源。这次调查的结果,我们梳理出“十八团”的组织、“十八魁”与“十八团”的联系以及梅花拳(义和拳)与“十八团”的关系等。1982年,我们继续前往威县,主要对临近该县的梨园屯、干集、固献、贺营等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查清梨园屯教案的来龙去脉。除了和当地的老人攀谈,还走访了一些在地方教会工作的神父,这为我们此后注意到拳民的对立面“传教士”,以及搜集、整理和利用外文文献提供了方向。1984年,我们到河北的新城、涿州、定兴、涑水和山东茌平一带调查,想摸清义和团的一支从新城经定兴、涑水、涿州发展到黄村的历史情形,而这支义和团最终构成了北京义和团的主力。

1986年年底至1987年年初和1988年10月,山东大学组织中方学者和来自日本山口大学等校的日方学者组成了中日联合调查团,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清末山东及直隶两省所辖六府(济南、东昌、曹州、广平、顺天、天津)、两直隶州(临清、济宁)、十县(平原、冠县、茌平、巨野、威县、房山、良乡、大兴、宛平、静海)为核心调查区域,重点调查义和团运动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自然环境等要素,旨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社会结构问题。1988年和1989年,在地方党政干部的支持和陪同下,我们又组织师生两度奔赴河北威县,重点调查历史上的山东冠县十八村、邱县十八村以及直隶曲周十八村这一片区域的社会结构问题。通过这两次调查,最主要的收获就是把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冠县梨园屯和威县沙柳寨的相关史实梳理清楚了。另外,山东大学刘天路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狄德满在1992年联合发起了中英义和团联合调查组,实地调查了威县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发展状况。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深感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华北地区的民间教门组织有密切关系,所以再次深入山东全境和河北地区的县市进行田野调查,但所调查的主题已不是以义和团运动为中心了。

**崔华杰:**从学术实践上来看,您认为田野调查所获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关系如何?

**路遥:**我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史料相结合,起初虽然缺少理论自觉和学理归纳,但后来意识到这一学术实践实际上从属于社会人类学的路径方法。至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关系,我结合个人从事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经历,认为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谈。

首先,口述史料可补文献史料之阙略。如,冠县十八村乃是一片“插花地”,虽然行政上属于山东冠县,但在地理上却深嵌于直隶威县东南。由于孤悬在省境之外,山东对其鞭长莫及,难以施加有效管辖,而直隶对之又没有行政治理权。正是类属于“飞地”这样的政治地理环境,才给义和团运动的起事和组织提供了适宜土壤。如果仅依赖文献记载,不进行实地调查,很难摸清这样的地理结构及其所蕴藏的独特文化风俗和民众心理。再如,1960年我发表的《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一文就是利用口述史料厘清了此前学术界所抱持的“义和团仅是义和拳演变而来的结果”这一固有成见,1980年出版的《山东义和团历史调查资料选编》也以无可替代的历史事实指明了义和团运动的地理起源是以曹州为中心的鲁西南,以茌平、平原为核心点的鲁西北,以及以冠县梨园屯、威县沙柳寨为连接点的直鲁交界地区等三个地区。

其次,口述史料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对民众的口述史采访,其得来的信息在很多方面可与文献资料印证互用,共同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实片段和发展过程。如,我在《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中所附的“梨园屯村耕织情况表”,以出租户、雇长工户、自耕户、半自耕兼租种户、雇农户、佃户为类,梳理了梨园屯拳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这是田野调查所得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参照印证的结果。再如,我们在巨野县一带关于民教冲突以及红拳会源起的口述调查,其在事实描述上与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的奏报几近一致,基本反映出教民及其背后的传



教士凌辱蹂躏平民,而导致平民加入拳会以自保的历史事实。

最后,对口述史料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对文献史料的轻视。1985年,我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运用了多方档案,被称为“近年来我国大陆上对多种义和团档案史料进行综合而深入研究的少有的好文章”。在2004年立项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清史文献丛刊·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我于2012年组织出版了五卷八册的《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收录中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事涉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语言文献资料,约计547万字,内容涉及各国官方档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内部文献等稀缺文献资源。2016年,我与狄德满组织编写《西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涉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瑞典、挪威、俄国12个国家的各类档案和著述文献。这些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文献集成丛编,在不同阶段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学术更新与发展。

当然,我还想提醒的是,一定要注意口述史料固然是对文献史料的有益补充,但更需要研究者去辨伪存真和综合分析,特别是要留意受访者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和情感偏移等对采集口述史料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口述史料的价值意义。

**崔华杰:**从您个人的田野调查生涯来看,从事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有哪些注意事项?

**路遥:**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不外乎以下几个要项。

一是制定采访提纲时要考虑综合因素。调查提纲可以说是调查者的指导思想,既要考虑搜集口述史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更要考虑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心。在1959年年底和1960年春的第一次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中,组织让我们拟好提纲后再下乡调查。为了做好提纲,我们不仅请教系里的一些老教授,还专门请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提了意见,对采访提纲作进一步的完善。最终,这份提纲分为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社会背景、义和团的组织来源、义和团运动的政治口号、义和团的斗争情况、清朝统治者与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这五类22个问题,其问题设置有当时阶级斗争史学的背景,但更多地带有调查者预设的研究意图,而我也正是借助这批口述史料才在1960年撰写发表了三万字左右的《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一文。另外,在问题设置上也要尽量采用开放型设问,不要过多设置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样才能打开受访人的话匣子,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想法和陈述事实。

二是要坚持地毯式调查。我们起初开展的几次调查,公共交通多是自行车,更多情况下需要徒步探寻。为了做到地毯式调查,我们一般是按县分为几大区域,每个区域设置一个中心点和指导站,由点到面进行流动性调查。比如,文献史料记载义和团“起于冠县十八村,原名梅花拳”,还有说“作俑于冠县之十八魁,即屡次拆毁梨园屯天主堂者”,但是“十八村”的历史由来通过文献难以有所确论,更谈不上找出梨园屯的具体位置。我们前期做了几次调查也没任何收获,数度险些放弃;后来,就是采用人海战术,进行地毯式调查,才最终把历史事实给挖掘出来。原来它远离县城70公里,逾越馆陶、邱县两县,孤悬于直隶境域。我们派遣学生先去鲁西南、鲁西北,顺着线索转赴冀南地区的威县、广宗、南宫、曲周等地,最终找到了山东、直隶省县交界处的“插花地”十八村以及梨园屯和沙柳寨,就是这样才查到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

三是让受访者主动发声。在调查之前,我们一般是先结合调查提纲,给前去调查的同学介绍义和团的背景知识,并要求他们将受访人的言谈原本记录,不要夹杂个人的主观理解和判断;深入村庄调查时,还要争取受访人的信任,访谈中不要打断受访者的叙述,顺着他们的思路将话题引到我们所

要的内容上来。我们在十八村的“政治经济中心”——河北威县干集走访时,偶然听到一位老大爷说干集的大财主潘老济是梁庄人。我们循此线索,立即奔往离干集三四公里的梁庄调查,但这里的村民经过前期政治运动的冲击,顾虑重重,不愿谈及过往,生怕受到牵连。我们遍访潘氏后人,最终取得一位年轻潘姓会计的信任,收集到潘老济、潘老栋、潘老彦的事迹。至此,我们才有关于“十八团”、团总和副团总的可信记录。

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从事义和团研究横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田野调查无可置疑地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比如,我们在第一次调查时自然抱有阶级斗争的思维,在确定受访者方面肯定存在片面性。当时考虑到贫下中农具有天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我们在调查时主要以这类群体为受访者,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况应当可信,而对富农、地主还有教会人士没有进行口述采访。现在来看,后面的这两类群体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更具有表达能力,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口述史信息,而且能够弥补贫下中农因为知识认知有限而出现口述内容同质化的缺陷。

另外,口述史料的使用既包括搜集整理,也包括资料保存、出版发行和研究利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两次田野调查搜集的口述史料,共计有一百三十多万字,但后来赶上政治运动,很多原始记录散失,直到1980年才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为名出版,其篇幅仅有二十四万字左右。现在我们身处信息社会,无论调查口述史料、还是对其保存、整理都有着较好的条件,口述史料也不见得付梓出版后才能推广出去、流传开来,电子媒介这一形式越来越受人欢迎。

**崔华杰:**田野调查对您学术路向的开辟有着什么影响?

**路遥:**在进行义和团运动的多年田野调查历程中,我显然需要深入民间生活,聚焦社会下层。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愈发感觉到义和团和民间秘密教门两者其实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比如,在以威县为中心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将实地探访所得的梅花拳(义和拳)组织的口述史料与乾隆年间的档案相结合,基本弄清了义和拳的师徒传承过程,证实了义和拳起初确实存在文场和武场之分,其背后有着民间宗教的重要成因。所以,随着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我开始触及民间秘密教门这一课题。

秘密教门在历史上因被官方视为“邪教”而只能秘密活动,公开见刊的文献史料对之鲜有披露,各教门辗转流传下来的内部经卷亦很少向外人开放。凡此种均说明依靠文献史料难以对其进行详尽的综合性考察,故而还是需要开展田野调查以回补文献史料的不足。为此,我踏遍山东全省以及河北部分地区的七十多座县城,对会道门组织重点活动的市县做了普遍考察。2000年,我运用这些通过田野调查搜集的口碑资料、族谱、教门图谱和各类经卷,并与清代档案文献和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所藏档案,以及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提供的文献史料相结合,写成《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依次详述了一炷香、八卦教、离卦教、圣贤教、九宫道、皈一教、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枪会及其变种等山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秘密教门的历史和概况。在研究中,我特别融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典型教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为叙事线索,重点揭示这些教门的起源与发展、教理与功法、组织与形式、仪式与文献等史事。《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出版后,天津社会科学院李世瑜撰文评介说“抢救了一大批行将销毁的宝贵资料,厥功甚伟”,堪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sup>①</sup>其评价的落脚点实际就是该书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

<sup>①</sup> 李世瑜:《民间宗教研究之方法论再议——兼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



### 三、立足本土与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

**崔华杰:**您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有着什么样的理论探索及变化,其背后的因素又有哪些?

**路遥:**新中国成立初期,囿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在革命史观的推动之下,国内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探讨仅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其视作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一样的民族战争,多是直线型的分析,这样就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局限于固化单一的因果解释模式,阻碍了对义和团运动复杂特性的认知。比如,学术界过去普遍认为,外国商品经济入侵导致华北地区大批小农破产,激化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农民阶级自发地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但是,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这一论证逻辑并不一定适用于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区。在鲁西北农村,五口之家、二三十亩的自耕农占多数,但因地理、生态自然环境等原因尚不能温饱,更谈不上有多余钱财购买帝国主义兜售的各类商品了。显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察义和团的成因或者源流实际上会造成解释不清、立论不足的问题。

要想推进义和团和教案研究,必须转换研究方法。起初下乡去做义和团田野调查,虽然是政治背景之下的衍生物,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越来越认识到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方法外,还必须与社会学、民俗学相关理论结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多角度多层次开展综合考察。义和团运动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且在一个广阔的农业社会舞台上展开,它不仅反映了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矛盾、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还带着浓厚的地域风情、宗族网络、民俗信仰、文化心态、人生信仰等色彩,所涉及的社会要素极其复杂。要想探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要从社会结构的整体寻找其复杂成因,并在不同历史契机中考察这些成因各自的不同际遇。为此,我们要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将义和团运动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之中,从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诸多变量入手才能探寻义和团运动复杂的社会成因和发展规律。

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由我和日本山口大学佐佐木卫为共同负责人的中日联合调查团赴河北省的威县和山东省的平原、临清、高唐、济宁和巨野等地,以“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为主题,分别深入农村和城市展开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搜集。在农村,我们主要调查户口、土地、种植、家庭手工业、集市、洋货、阶级、阶层、宗族、宗教、民教矛盾、团练、拳术、秘密结社、灾荒等情况;在城市,调查的要目是商业、手工业、钱庄、当铺、物价、洋货、民教矛盾等。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想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作广阔而深入的探索。比如,在政治结构方面,是想摸清地方基层政权的构成、地方领导人如何产生以及何种程度上影响地方社会、教会在地方社会的势力、教会势力和地方官府的关系等问题;在文化结构方面,是想摸清地方社会的私塾学堂情况、知识阶层对教民和拳民的态度、地方民间信仰在义和团兴起时的作用等问题;在经济结构方面,是想摸清土地分配、集镇贸易、自然灾害等问题。当然,除了社会结构分析,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甚至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也被相关学者应用到义和团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使得我们摆脱前期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局限,转向研究义和团产生的社会因素及其多样构成,这样无疑拓宽了义和团研究的范围,并随着时代变迁而衍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

21世纪,我多次指出义和团研究实际上仍有“两大难题”需要解决:一是义和团运动起源,这一问题通过20世纪的几次田野调查得到了一定改善;另一个就是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中心的义和

团战争问题,这需要搜集、翻译、出版所涉国家的档案资料并结合军事学的专业知识才能予以解决。考虑到义和团战争所参与的国家之多,所涉及的国际关系之复杂,以及影响的东亚国际关系之深远,我深信义和团战争方向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当然,无论从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史学驱动下的义和团起源研究,还是到21世纪以来跨学科视野下的综合研究,我始终认为一定要锤炼出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形成自己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属性和话语符号。

**崔华杰:**一般认为,西方学者在跨学科研究上更具有理论优势。您在学术研究上是如何与西方学者交往并实现知识互补的?

**路遥:**1978年12月,美国匹兹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欧文·舒尔曼(Irving Shulman)带团来山东大学访问,专程到历史系交流,建议将义和团研究作为两校交流的重点课题,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研究自此重新开启。1979年11月,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周锡瑞来访,将义和团研究作为其科研方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正是通过周锡瑞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决定在义和团运动80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孔飞力和柯文、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分校的包德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狄德满、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佐藤公彦等学者多次来济南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同我们进行联合课题研究,总之,形式不一的中外交往为我们打开了学术交流的另一扇天窗,使我们了解到海外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

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要想真正赢得海外学者的尊重,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别具一格的学术话语。周锡瑞在其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所做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成为他重新探索和构建义和团早期历史“不可缺少的材料”,为他打开“农民的视角”去观察中国农民运动。<sup>①</sup>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韩书瑞在其《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又说,“正是路遥先生的著作首次将我带入山东西部,我非常感谢他这些年来慷慨而坚定的努力。从我们首次见面至今,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终于看到这部山东故事得以翻译出来。”<sup>②</sup>这些表明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时,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并锤炼和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这样在国际学术界才能赢得尊重并把握住学术话语权。

**崔华杰:**您如何看待西方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理论范式?

**路遥:**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提出了各具特色、风靡一时的理论或研究范式,这些理论或研究范式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在研究中其实也是不自觉地吸收借鉴西方学界有关理论方法。在义和团研究上,我由先前革命史观指导下的直线型因果关系研究,一步步转变为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知识,从社会史角度对义和团产生的社会结构要素及其相关联系加以分析。这样做的优点就是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范围,也绘制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正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学界的有关理论或研究范式,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在教学中将我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作为应用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参考书推荐给师生。但是,我在运用这些西方学界理论的资源时,始终认为不能鹦鹉学舌,不要盲目套用,否则只能成为西方理论体系的注释。所以,我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对义和团运动作共时性因素分析,还

<sup>①</sup>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sup>②</sup>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着重描述义和团运动起源发展的历时性过程,并格外勾勒历时性和共时性要素在义和团发展构成中的转换关系,由此形成了鲜明独特且自成体系的研究风格,在对外学术对话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和解释框架。

**崔华杰:**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这方面,您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路遥:**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掌握充实的资料是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前提。无论从义和团运动到山东秘密教门,还是再到内容更为宏富的中国民间信仰领域;无论爬梳于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还是行走于田野的口述调查,我这样做的目的都是穷尽一切方法夯实史料基础。我前面谈过,2004年我主持申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经团队八年努力才汇集出版了五卷八册的文献资料汇编。2000年后,我注意到义和团运动研究发生了从起源发展到战争相关议题的学术转变,便组织力量对海外所藏的义和团战争各类文献做专题搜集与译编。周锡瑞曾这样说,“中国老一代学者长于实证研究,过去我在国内的山东大学作研究时,深为这一优良学风所感染”,<sup>①</sup>这也是我长期坚持的治学风格。

当然,重视史料并不是说要摒弃理论和方法,在我看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正是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一步步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学术话语。如果青年学者要想投身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洪流并有所建树,我认为首先就是要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还要吸纳借鉴西方学界的有关方法范式,但最重要的是要根据本土实际进行独立的学术创新。

上述观点,我还是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为例予以说明。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岗校长带动下,山东大学师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正值学术起步的我深受其感染。在接下来的义和团研究上,正是因为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才投身于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调查;又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知识的指引之下,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了诸多口述史料,为后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通过这些学术经历,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切的感悟,就是理论指导和跨学科研究对推进义和团运动的学术研究实在重要。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的领域十分广阔,在研究方法的取径上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的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还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实际与学术生态,从中国历史、社会以及学术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使之本土化与中国化。总之,在理论吸收借鉴方面,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不能对西方学界塑造的各色理论亦步亦趋甚至是趋步俯仰,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提供历史注脚,而是要根据本土实际有所创新,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奉献自己的力量。

(访谈整理者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敖凯)

<sup>①</sup> 韩毓海、董正华采访:《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周锡瑞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